

REDIANPINGLUNCONGSHU



热点评论丛书

主 编：许柏林

副主编：丁道希

# 双刃剑下的评说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 编

- 笔下留人
- 沉论的殿堂
- 用人格拷问灵魂
- 从庙堂文化到庙会文化
- 尖锐还是尖刻
- 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
- 我观王朔聊鲁迅
- 王朔，请担起责任来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序

---

## 序

柏 林

时代快车上,大众传媒中,市场经济下,思潮激荡,文化多元。我们想给这本“热点评论”起一个书名都比较困难。原因是:一、热点不集中,概括尚不得要领;二、准备不充分,文章还不成阵势。曾有几个备用书名,如:1、《笔下留人》;2、《沉沦的圣殿》;3、《双刃剑下的评说》;4、《拷问灵魂》;5、《问到无愧处》……

《笔下留人》是阎纲先生的短文,对文坛不断袭来的急风骤雨,挞伐翦灭,提出了中肯的劝说:请息雷霆之怒,笔下留人!好一个“笔下留人”!让人想到“刀下留人”!我们再引申一下:文学是人学。“笔”下如果留不住“人”,何言文学!何言评论!何颜见江东父老!

《沉沦的圣殿》是李舫女士的喟叹。如今,文学的圣殿还有几分圣洁?谁来挽救这沉沦?

《双刃剑下的评说》是由郑伯农同志的“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引发而来的。在当今社会,岂止“市场”是“双刃剑”?“大众传媒”、“现代科技”、“解放”、“更新”、“自由”……无一不是“双刃剑”。“双刃剑”下还容不容“评说”?

## 双刃剑下的评说

---

《拷问灵魂》的由来是何西来先生讲到：“作家解剖人物，也解剖自我；拷问笔下人物的灵魂，也拷问自己的灵魂”。那么，在物欲横流、刺激至上的今天，人们还有“灵魂”么？还用“拷问灵魂”么？怎样“拷问灵魂”呢？

《问到无愧处》则是由“拷问灵魂”所拷出来的题目。不论世道多么波诡云谲，瞬息万变，人们决不会用智慧来欺骗自己，总是会守住自己那一份“真诚”。自己的所思所言、所做所为都是“真诚”的吗？几人敢言“我问心无愧！”——不是为了欺世盗名，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不是为了蔽人，不是为了蒙钱，不是为了贪官，不是为了好色；是为了爱心、为了正义、为了真、为了善、为了美、为了光明、为了公理。人与人相通处惟“诚”为桥，“欺”即“弃”，“诈”便“炸”。每日每事，所言所行，扪心自问，问到无愧处：诚哉？伪哉？善哉？恶哉？问到无愧处：便去行动，便去立言，便去做人。“以德治国”的要义在于“以德治心”。

评论从真诚开始；评论靠真诚发光。

上述这些草拟的书名，不知选用哪一个为好。最后定下了《双刃剑下的评说》。不知您以为然否。

尽管作为一本书，一次集合性演练还很有欠缺，还无阵无法，但是，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们深入思考、认真写作的，其中，最鲜明处是学理性、针对性较强。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的想法是，结合文坛热点，发出真诚的声音，以一种“实践的——大众的——学理的——鉴赏的”批评方式，

## 序

---

来同文艺家们、同人民群众一道共同促进文艺的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们将继续努力。

是为序。

2001 年严冬于“长梦屋”

目 录

|                                 |            |
|---------------------------------|------------|
| 序 .....                         | 柏林( 1 )    |
| 笔下留人 .....                      | 阎 纲( 1 )   |
| “沉沦的圣殿” .....                   | 李 舫( 4 )   |
| 用人格拷问灵魂 .....                   | 何西来( 8 )   |
| 做一个“双刃剑”下的清醒人<br>——文艺评论二题 ..... | 郑伯农( 18 )  |
| 从庙堂文化到庙会文化 .....                | 丁道希( 30 )  |
| 都市流行话题<br>——介入社会的评论 .....       | 何志云( 50 )  |
| 别去“合谋”<br>——批评的层次及其他 .....      | 贺绍俊( 62 )  |
| 文化批评的游戏规则 .....                 | 祝 勇( 70 )  |
| 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                  | 陶东风( 76 )  |
| 尖锐, 还是尖刻<br>——呼唤真正的文艺批评 .....   | 朱辉军( 93 )  |
| 旁观者说 .....                      | 张德祥( 111 ) |

## 双刃剑下的评说

---

酷评:虚拟的文化批判 ..... 许松林(120)

### 鲁迅是谁

——论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理论创新

兼与谢泳先生商榷 ..... 曾镇南(138)

中国文学的尴尬十年 ..... 萧立军(180)

### 多些“和”气

——读《十作家批判书》随想 ..... 何西来(186)

### 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

——致葛红兵 ..... 红 孩(190)

“王朔现象”:一个可以认读的符号 ..... 北 野(197)

我观王朔看鲁迅 ..... 张梦阳(202)

无知者无畏:红卫兵情绪的死灰复燃 ..... 王开林(213)

帮王朔策划后半生码字生涯 ..... 熊国标(219)

王朔,请担起责任来 ..... 许柏林(226)

### 附录:追寻时代 贴近生活

——首都部分文艺评论家座谈会摘要 ..... 玉 子(247)

后 记 .....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260)

## 笔 下 留 人

阎 纲

蔑视权威，锐气逼人！陕西师大出版社急忙投入市场的《十作家批判书》“要把取了不当名声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实施“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

读这本书，我圈点甚多，激动，陷入深深的思考。

文学批评的理性化和个性化，文学批评成为不依附于权威势力和权威作家的独立的学科，其本身就是新文学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只能擦皮鞋不能修皮鞋的日子已经过去，不准人说话的时期已经过去，尽管有的时候欲言又止。

结论是惊人的：钱钟书被戏拟为“上帝”，然后把“上帝”的“经典”《围城》说成非小说的“伪经”；余秋雨式的《文化苦旅》是“甜蜜”的行旅，是“文化口红”，是“与国家的和解”；王蒙“自我保护”，以“忠诚”“应战”“信仰危机”，精明、圆滑、世故；梁晓声把苦难化为美丽，把激情变成“作秀”；贾平凹“‘道’貌岸然”、“肾亏依然”；汪曾祺在“‘人性’旗号下说谎”，是“捧出来的佛爷”；一脸坏笑的王朔不过是“形而下的天才”，可“你本就是一代宗师”。

“和解”说，是政治概念，“招安”说，更是政治概念，“文化口红”说、“肾亏”说、“说谎”说、“伪经”说几近乎品格评

价了。

争论的焦点从创作上的是与非转而为作家人身的好与坏。批判力避感情用事伤了和气,切忌诛心之论造成人身伤害。

作者们对“聪明”进行批判。王蒙、王朔、王小波、苏童都“聪明”,但苏童的聪明是悟性,王朔的聪明是天才,王小波的聪明是鬼才、智者的幽默,王蒙的聪明却是“圆滑”,是“宽容”,是“生存保护”、“不得罪人”,再以“忠诚”引申下去,王蒙就不成个人样了。

保命哲学与生命哲学大异其趣。不管怎么说,“聪明”就是聪明,聪明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王小波自己说:人类侥幸拥有了智慧,就应当善用它,再不要以愚昧糊涂蛮不讲理为荣,不要以聪明文明明白为耻。

看来,《十批》的批判在纷繁结构的庞大系统中分析、综合、判断中还有问题,但最为重要的是理性批判的科学理论尺度。吾爱自由,吾更爱科学。

《十批》的作者们进行批判时,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叙述方式,高扬先锋诗歌的语言精神,敏感、机智、傲慢、犀利;它以渊博的本国文化为资源,追求独特话语,旨在实现“人”的生命价值和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建立中国化的实验文体。这种文体注重文本解析,小至一部作品,大至国内国际,手中的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是一流的。它注重借用西学,目的在于理性批判。它最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极富挑战性和杀伤力。它蔑视权威,是骡子是马,都请到

“理性审判法庭”接受审判。片面性是难免的,只要言之有据,纵使片面也深刻。这种文体和学风自有它的长处,有些长处恰恰是现今文学批评中所欠缺的。

关于这场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的批判曾经进行过多日,现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争论一方的言论汇集成册,对于这场是与非的学术之争不无好处,可是,就今天的讨论来说,请柬却将议题引向“经典”还是“伪经”的风车大战。书中的十名作家中并没有哪位的作品被正式加封为“经典”,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不是有点拿名人开涮吗?

希望以该书的出版为契机,伸张科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诸子横议,百家争鸣,独立思想,自由文章,让文学遵守“游戏规则”,在竞争中繁荣起来。

我急于要劝说的是:请息雷霆之怒,笔下留人!

## “沉沦的圣殿”

李 舫

我们一直在试图寻找着一种可能,让文学的界定成为拯救现实于危难的良方,但我们总是饮憾而归。

这种拯救的艰难与延搁是不言自明的。文学经过几次冲锋和迂回却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提高文化品位,一方面又不能丧失生活实感;一方面要扩大作品的内向性,一方面又要保持故事的可读性。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叙事文学,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更使它蕴涵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成份,小说开始打破了英雄神话的幻觉,从而向平民化、个性化、平实化、私人化靠拢,于是任何固定的、传统的观念和价值都变得可疑起来,小说家们从而着手创造与以前时代迥异的言说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进入90年代,这种风气更是一路飙升。于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年代俨然诞生,质疑公理、揪斗权威、封杀道义、叫拙耆宿、斩断传统,甚至摒弃廉耻,一时间蔚然成风,文坛变得异常喧嚣和浮躁,大大小小的“写家”们仿佛一夜之间洞悉了嘲讽和聊以解嘲的“文学法门”,充满了轻狂的“豪迈”之气和野逸之态,随之而来的,在某些“作品”中,主题被悬搁起来,历史被风干了,现实变得疲软无力,理性开

始了大规模的撤退，甚至连铺陈的叙事情节也不见了——那么，还有什么用来维系叙述？一些所谓的“隐私文学”和“自传半自传体”身心体验小说粉墨登场——当叙述者再也无法知道为了增加刺激或为了“生存”下去而应该做什么时，他们（她们）就将自己淫卖，露出羞处，把它暴露在大众面前，用以作为支持他们文本框架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一大批出生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的“新生代”作家的诞生，一些“新新”女作家们扛着“性本论”的大纛，赤膊上阵，从文学边缘渐渐挺向中心地带。为了让文坛的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她们不再满足于瓦解传统叙事方式、颠覆旧有的价值观念等“粗浅”的手法，而是效仿某些港台影星“取道”三级片影坛平步青云的捷径，从兜售隐私和细描情爱开始，以不怕读者“扔臭鸡蛋”的无耻精神和展览肉欲的“先锋意识”，钻入浮躁一时的文坛。

这些作品大多语言苍白，叙事单调，情节重叠，结构单薄，以放纵生命本能为炫耀，以哗众取宠的性事叙述为线索，以所谓的另类情爱的女性体验为标榜，将一种沉糜堕落、颓废荒淫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引入极端。

然而，何以这样一种刻意描写人类兽性本能的作品如此受人青睐？拥有如此广阔的受众？某些读者的恶俗需求、文论家的推波助澜、出版商的唯利是图……共同完成了“几粒米煮一锅粥”的“市场操作”。

人们常说，文学是净土，是神圣的殿堂，守护这座殿堂，无疑是一份清苦而寂寞的工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言：

“以笔墨为生是世界上最苦的事。”尽管有人不无辛酸的喟然长叹：“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还是有许多有志之士甘守清寂，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至死不悔。每时每刻，他们孜孜矻矻，不断问，文学是什么？文学究竟要表达些什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在那里造就和毁灭着文学？这坚执而焦躁的追问，也许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人心不死，文学不亡。而那些脱离了汉语创作坚实的大地，脱离了文学发展丰盈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拾得马格丽特·杜拉斯、亨利·米勒的皮毛，便敢于上来大跳脱衣舞的漂亮女作家们，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圣殿是不容玷污的，不论是怀着深深的善意还是淡淡的嘲讽，不论是哗众取宠的颠覆还是暴露隐私的淫卖，不论是苦心孤诣的心灵放逐还是剑拔弩张的词语解构。批判的锋芒、反讽的情绪、超然的心境、不屈的态度固然可以使人痛快一阵子，但要作为成熟而牢靠的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还远不足以胜任。对于粉饰的太平，充满刺激的堕落，用香水和肉欲雕琢的文字，口诛笔伐未必明智，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样也对付不了眼前的衰湮和背叛，无论人类的本性怎样异化，文学的进步最终依赖的唯有自身的警醒和自觉。

丑小鸭会变成天鹅，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杀人狂魔不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尽管英雄不论出身，可是历史终究不能抹杀。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都何其迅捷短暂，两千年已转身成忆，未来的岁月也

## “沉沦的圣殿”

---

终将褪为沉沦的过去。当有一天,我们筚路蓝缕的历程被压缩为文学教科书中薄薄的一章以至短短的一页时,希望我们的子孙们不要将它界定为“由文坛娼妓炮制出来的娼妓文学”。

## 用 人 格 拷 问 灵 魂

何西来

学习了《邓小平论文艺》，有很多感想，我想在这里着重谈谈理论批评家自身的人格建设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作家被称为时代的良知，社会的良心，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理论批评家也一样。区别仅仅在于，作家是通过创作实践，通过文学作品，通过作品所创造的情调、意境、人物、典型而发挥作用的；理论批评家则是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评论，通过把具体生动的创作经验上升为理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而引导读者，影响创作，发挥作用的。当然，理论批评家们研究的对象不只是作家和作家的创作活动。作为对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过程的关注与追踪，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和鉴赏活动，也同样是理论批评家研究的对象。文学理论，正是在对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读者的鉴赏经验进行概括与综合的过程中积累、建立起来的。因此，这理论，不仅对于从事创作的作家，而且对于进行鉴赏的读者，都起着某种程度的引导作用。

作家面对的是社会人群的灵魂，作品描写的是社会众生相，是把各色人等的灵魂放在艺术的解剖台上指证给读

者看，鞭挞丑恶，褒扬美善。作家解剖人物，也解剖自我；拷问笔下人物的灵魂，也拷问自己的灵魂。写悲剧，把人间善和美的事物毁灭给读者看，让真正的价值在毁灭中得以永生；写喜剧，则嘲笑那些渺小的、丑陋的、卑劣的东西，让人们在笑声中洞见自己的灵魂，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理论批评家，写专著，写评论，无论是分析作品中的人物，还是捕捉作家的创作意图，都不能不面对不同人的灵魂。诸如“民族灵魂的建造”，“民族灵魂的重铸”，“关注人和人的灵魂”等，更是他们笔下经常论说的话题。可见，他们和作家一样，扮演着灵魂工程师的角色。

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说：“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江泽民同志在六次文代会和五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并且指出，“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也是人民群众关怀和支持文艺事业，敬重文艺工作者的根本原因。”我以为，两位领导人所说的“灵魂工程师”不仅指作家、艺术家，而且也包括理论批评家。

你既然是灵魂工程师，要帮助别人建造灵魂，那好，人家说，你先建造一下自己的灵魂给我们看。这叫正人先正己，己不正，则无以正人。这也是我觉得理论批评家应该重视自己人格建设的重要根据，第一个根据。

第二个根据是，包括理论批评家在内的文艺工作者，

确有很多人放松了自我人格的建设。行为失据,道德颓落,投机钻营,蝇营狗苟之类,并不罕见,有时还很扎眼。多数理论批评家对此也还缺乏应有的自觉,从人格建设角度提出问题,作出分析与判断的,就很少。

前几年曾有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值得肯定的是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关怀,也涉及到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但有的学者不是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即从建设与现代市场经济相一致、相配套的人文观念,新的人文观念上解决历史转型期某些负面的精神现象,而是把诸如官员的腐败,局部的道德滑坡,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坑蒙拐骗,一切向钱看等,都归罪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从而多少流露出某些怀旧的倾向。但无论如何,提出这个问题,引起知识界的关注,促使大家朝这个方向思考,总归是有意義的。

过去,在长达几十年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对知识分子抱有歧视和戒备的心理,与之相应的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都出现了“左”的偏差。如把知识分子们大多数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转变立场”,“脱裤子,割尾巴”,把他们比做毛,常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话来提示他们认识自己的现实处境。特别是强制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进行不断的,没完没了的歧视性的改造,污辱性地要他们“夹起尾巴做人”。这一切,都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人格与自尊。

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认识论,人们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包括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改造自己的生理面貌和精神面貌。但是,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与戒备,愈来愈走向极端,不是如实地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是视为异己的敌对力量。接连的政治运动,多以他们为对象,用这种办法强制他们进行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给他们中的许多优秀代表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这种人格歧视性的改造,一直持续到“文革”,许多知识界的泰斗、大师,通通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称谓,那已经是文化的荒漠了。郭沫若说恨不得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著作付之一炬,俞平伯作诗说自己的学海苦航是“昔年枉学屠龙技”,环境所迫如此,这不是学者学术品格和人格的悲剧吗?

这种歧视和戒备的方针政策,以及作为其理论根据的一系列“左”的和极左的观念,在新时期以来党所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纠正。这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式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像工人、农民一样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不能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叫做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邓小平同志还响亮地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使知识分子所扮